

明月之而

史
学
文
选

人生到处知何似？

恰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

苑书义◎著



人
民
出
版
社

明月之而

史学文选

人生到处知何似？

恰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

苑书义◎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乔还田

责任校对:周 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月斋史学文选/苑书义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

ISBN 978-7-01-007339-2

I. 明… II. 苑… III. 中国-近代史-文集 IV. K2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5846 号

明月斋史学文选

MINGYUEZHAI SHIXUE WENXUAN

苑书义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49

字数:800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07339-2 定价:10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卷 首 语

岁月悠悠,人生苦短,瞬间老矣。每当我在吟诵“高堂明镜悲白发”时,如烟的往事,仿佛就在昨天,纷纷涌上心头。回想当年在大学研究班时,年少气盛,自以为“才清志高”,梦想有朝一日成为著名的学者和教授。怀着美好的憧憬,二十四岁离开长春母校,独闯陌生而又神秘的燕赵大地,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梦想终难成真。“书生事业真堪笑,忍冻孤吟笔退尖”。为了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葑菲不弃,敝帚自珍”,特将部分论文编辑成册,以就教于师友。入选论文,观点依旧,编排大体以不同类别和发表先后为序,旨在如实地反映个人学术探索的历程和学术观念演进的轨迹。文选以个人书斋命名。我出生在东北边疆一个名叫明月沟的美丽山村,“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明月就是我心中的故乡。

我在河北工作生活五十四年,河北是我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河北省和河北师大的各级领导,对我关爱备至。正是这种亲切的关怀和热情的鞭策,才使我有了一切包括这本文选的问世。我虽已步入暮年,但愿将余生奉献给我所挚爱的这片燕赵热土。

代序:我的史学观

我出生在祖国东北边陲,从小就受到外国侵略者的残酷压迫和奴化教育,饱尝了人间的辛酸。祖国母亲把我从苦难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先后送入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班学习,培养成为一名历史教育工作者。40余年来,交织着屈辱与抗争、黑暗与光明的近代中国历史,无时无刻不在撞击着我的心弦,推动着我去追踪探源,在近代中国史学的领域里,虚心学习,摸索前进。广收博采,推陈出新,成为我的座右铭。

一、近代中国进步潮流的演变

长期以来,我专攻1840—1919年间的近代中国历史。在近代中国历史长河中,始终存在着两股互相联结而又互相排斥的潮流:一股把中国推上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一股把中国推上独立、民主和资本主义道路。前者是阻挡历史前进的逆流,后者则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流;前者来自资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殆无疑义,那么后者的阶级内容是什么呢?史学界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概括言之,主要存在两种不同见解,即“三次革命高潮”说和“四个阶梯”论。“高潮”说是建国初期提出的,是批判资产阶级唯心史观所获得的积极成果。它认为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出现过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阶梯”论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试图站在现在的高度重新认识过去历史的结果,它认为在近代中国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斗争,经历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四个阶梯。“高潮”说和“阶梯”论既有相通之处,即无不承认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又存在着原则性分歧,“高潮”说立足于反帝反封建斗争,因而排除了洋务运动,“阶梯”论立足于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斗争,因而肯定了洋务运动而排除了义

和团运动。我结合近代中国社会实际,研究了“高潮”说和“阶梯”论,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对近代中国进步潮流的看法,起初是在承德由《读书》杂志社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提出的。随后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洋务运动讨论会的大会发言中又作了发挥。《近代史研究》杂志社一位负责人在上海听了我的大会发言,约我写一篇文章,这就是《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发表的《论近代中国的进步潮流》一文的由来。

我认为要弄清近代中国进步潮流,首先必须弄清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及其解决的道路。而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及其解决的道路,则取决于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近代中国没有按照正常规律从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走上了属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这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的结果。压迫和阻止近代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东西,就是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中国的地主阶级。因此,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历史主题,是外争独立,内争民主,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改变成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而坚持反对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则是解决这个历史主题的根本道路。

我认为要弄清近代中国进步潮流,必须正确评价农民和资产阶级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在近代中国历史的研究中,以往有过拔高农民作用、贬低资产阶级作用的倾向,近些年来又出现了矫枉过正的倾向,拔高资产阶级作用、贬低农民作用。这都是不足取的,因为没有如实地反映客观的历史实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占有重要地位,对历史进程起过巨大作用。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但不是社会政治革新的体现者,农民斗争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出现是近代中国社会的重要变化之一,中国资产阶级有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民族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和社会政治革新的体现者,民族资产阶级如果不同农民结成联盟就不可能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达到胜利。

我认为要弄清近代中国进步潮流,还必须对洋务、维新和义和团运动作出合乎实际的评价。判断社会运动,必须有一个能够反映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隐藏在众多现象后面的本质的标准。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

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①我认为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是评价中国一切政党、各类社会运动和各色人物是进步还是反动的终极标准。根据这一标准，考察洋务、维新和义和团运动，可以看出，洋务运动虽然对外国侵略者有抗争性，对封建躯体有“风化”作用，对民族资本有刺激作用，但就整体说来，对外妥协、对内维护封建躯体、阻碍民族资本的发展却是主要的，是决定其性质的主导方面。有的论者往往把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相提并论，我认为这种作法是不妥的，因为前者是地主阶级改革，后者是资产阶级革命，两者在是否由先进阶级充当主角、是否“武装夺取政权”、是否破坏“统治阶级的政权基础”等三个方面，存在着质的差异。戊戌维新是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而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在 19 世纪末叶中国的特定的条件下是进步的，不能说其实质是用从上而下的改良办法来抵制农民革命。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是以民族战争为表现形式的农民战争，起了为资产阶级进行社会改革开辟道路的作用。

我认为在每一个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作为社会发展动力而涌现出来的进步潮流的阶级内容，是由该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关系决定的。近代中国是一个过渡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比之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要复杂得多，致使近代中国的进步潮流具有一些鲜明的特点：（一）近代中国虽然只有短短 80 年的历史，但其进步潮流却有一个从低级形态向较高级形态发展的过程，阶级内容经历了几次重大的演变；（二）近代中国各个发展阶段的进步潮流，往往不是以单一的形式出现的，而是由形式各异、内容不同的几股阶级浪涛汇合而成，其中有一股是主要的，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各股的存在和发展。

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864 年太平天国失败，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这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初期。农民运动和地主阶级改革派、初步接受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某些活动，是当时进步潮流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其中以农民运动为主，规定或影响着其他两种力量的活动。

从 1864 年天京沦陷到 1901 年义和团运动失败，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的进步潮流主要是由

^①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8 年版，第 980 页。

农民运动和以改良派为主流派、革命派居于次要地位的资产阶级运动构成的。农民运动和资产阶级运动两股浪涛竞相涌起,互相激荡而最后分道扬镳,这正是从自发的农民运动向自觉的资产阶级运动过渡的时期的鲜明标志。

从1901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在民族资产阶级内部,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地位发生了变化,革命派压倒改良派而成为主流派,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成为时代的主流,农民和工人的斗争直接或间接地加入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领导的革命运动。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的进步潮流的演变,似乎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农民运动——农民运动和资产阶级运动——资产阶级运动。由我主持编著的三卷本、140万字的《中国近代史新编》(人民出版社出版),就是按照这一构想写成的。

二、李秀成评价问题与太平天国史研究

我研究近代中国历史,开始阶段是以太平天国史为主攻方向,兼及其他领域。

太平天国运动把中国历史上的单纯农民战争推向高峰,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发生过巨大作用,因而深深地吸引着我的注意力。研究太平天国史应从何处突破?在一段时间内,这个问题一直萦绕我的心头。经过反复考虑,我决定把李秀成作为研究太平天国史的突破口。因为李秀成不仅经历了太平天国整个过程,成为太平天国后期重要支柱,而且留下了记述太平天国兴衰的文字资料——《李秀成自述》。按照传统看法,李秀成是一位军事将领。我就是因袭这种看法,首先研究李秀成的军事战略的。随着研究的深入,视野逐渐扩大,我发现李秀成不仅是一位军事家,而且是一位政治家。在全面研究李秀成的进程中,我碰到了李秀成晚节这个难点。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泰斗罗尔纲先生起初认为李秀成被俘后写自述的企图,是“学蜀汉大将姜维伪降钟会故事伪降曾国藩,以恢复太平天国”,后来又认为李秀成被俘后写自述是为了“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保存革命力量”、“争取曾国藩把对内的矛头转向对外”。我经过仔细研究,认为罗老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1961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太平天国110周年大会,我向会议提供了题为《略论农民英雄李秀成》的论文,并在

大会上作了发言。会后,《北京日报》将这篇论文发表了。这是一篇全面论述李秀成一生活动的文章,包括李秀成的军事战略、政治作为和晚节等问题,反映了我对李秀成的整体看法。我认为,复杂的阶级斗争把李秀成推上太平天国的领导舞台,他向天王提出了革新朝政的方案,并创建了苏浙根据地,成为一位有所作为的政治家;他统率太平军南征北战,支撑太平天国后期危局,始则把斗争矛头指向清朝封建统治者,继而将斗争矛头指向中外反革命的联合进攻,成为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在被俘后写了“自述”,一方面概括地叙述了太平天国始末和本人战略,揭露了中外反革命的罪行,总结了太平天国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又贬损自己,颂谀刽子手曾国藩,提出了“招齐章程”,表示了乞降之意。李秀成的乞降,是由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和他的政治思想状况决定的。乞降固然是一种变节行为,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李秀成在被俘前作为农民领袖的历史地位。这篇文章发表后,受到史学界的好评。有个出版社约我写一本“李秀成传”。于是,我便筹划把这篇文章扩展成一本传记的工作,正当我在埋头撰写“李秀成传”的时候,一场政治批判风暴却席卷而来。1963年戚本禹在《历史研究》发表《评李秀成自述》一文,断定李秀成自述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李秀成是一个屈膝媚敌的革命叛徒。在我的心目中,李秀成是一位农民领袖,怎么能把农民领袖打成叛徒呢?1964年罗尔纲在《历史研究》发表《忠王李秀成苦肉缓兵计考》,批驳了戚本禹,断定李秀成自述“那些自污的话和向曾国藩提出招齐章程乃是一条苦肉缓兵计”。一个说是叛徒“自白书”,一个说是“一条苦肉缓兵计”。孰是孰非,引起我的深思。我既不赞成戚本禹的论断,又不同意罗老的考证。于是,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撰写了《李秀成及其自述的评价问题》一文,同戚本禹和罗老商榷,我认为李秀成自述“是一份带有若干追念太平天国内容的但主要是向敌人乞降的文件”。李秀成乞降既伏根于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更取决于他本人的思想状况。李秀成的乞降无疑是一种变节行为,但是他乞降未成,招降未就,不能因为他的乞降而否定他在变节前的农民领袖的历史地位。权衡轻重,应该承认他一生活动的主流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当时,我天真地认为关于李秀成的评价只是一个学术讨论问题,就抱着学术讨论的想法,把文章寄给《历史研究》杂志社。不料,形势很快急转直下。《人民日报》转载了戚本禹的文章,并发表了罗尔纲的《忠王李秀成的苦肉缓兵计》一文,罗、戚两文针锋相对。作为第三种意见,《人民日报》从《历史研究》将我的文章要去发表了。表面

看来好像是在进行一场学术讨论,实际上是在玩弄“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把戏。因而戚本禹又抛出《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一文,完全撕掉学术讨论的遮羞布,影古射今,为即将揭幕的“文化大革命”及其所谓“揪叛徒”的罪恶活动鸣锣开道,并把罗老和像我这样的人打成叛徒辩护士。“文革”期间,我对李秀成一分为二的评价,被说成是折中主义即修正主义,我则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史学界迎来了“百家争鸣”的春天,对李秀成评价问题的非法禁锢才获得解放。1979年我在《河北师院学报》发表《李秀成评议》一文,对李秀成一生活活动进行了全面论述,这篇文章不啻是我对李秀成研究的总结。

李秀成研究带动了我对洪秀全、石达开和洪仁玕等人的探讨,这些人物都是太平天国运动造就的农民领袖,在他们身上凝结着农民阶级的优秀品质和种种弱点,功过参半,瑕瑜互见。研究和正确评价他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有助于了解太平天国成败得失的全貌,揭示出这场农民运动所产生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和阶级斗争规律。我在研究太平天国人物时,坚持了下列原则:判断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主要的应该是全面考察他一生中全部活动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及其作用之大小,是有利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呢?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不能以某个有定评的历史人物作为评价其他历史人物是非功过的标准。不能以历史人物的道德因素、或气节表现、或某种行为的思想动机来评定他的历史功过。对于大节有亏或晚节不终的人,也应以“历史作用”为标准,作出合乎实际的评价。

我以李秀成为突破口,研究了许多太平天国领袖人物,并进而探讨了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问题,相继发表了《洪秀全与〈资政新篇〉》、《勇于改革的思想家洪仁玕》、《石达开大渡河被俘真相》、《评太平军二次西征的“最佳方略”》、《太平军进攻上海是否“重大失策”》、《君主制与天国悲剧》、《太平天国苏浙政权的特点》、《李鸿章与太平天国》等专题论文。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我写成了《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太平天国运动部分,共计20万字。其中我对洪秀全早期思想、太平军战略得失、太平天国的国体政体、纲领政策、天京内讧、根据地建设、人物评价、历史地位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国近代史新编》太平天国部分,可以说是我30多年来潜心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集大成之作。

三、李鸿章研究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

在写完《中国近代史新编》之后,我的研究重点就逐渐转移到李鸿章方面。研究李鸿章,起初是为了研究太平天国的需要。我发表的有关李鸿章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李鸿章与太平天国》,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当然,这同人民出版社约我写一本李鸿章传有着密切关系。

能不能为李鸿章立传?这是我首先碰到的问题。过去有一种说法:只应给“正面人物”立传,不能给“反面人物”树碑立传。我认为这种说法把本来极其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和绝对化了。事实上,并非所有“正面人物”都能立传,也并非任何“反面人物”都不应立传。

这里牵涉立传的目的和标准问题。立传的目的,不在于立传本身,而在于“古为今用”。人物传记是一种具有独特社会效益的“教科书”。“正面人物”“其善可以示后”,“反面人物”“其恶可以诫世”^①，“彰善瘅恶”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应为所有正反面人物立传,其实有必要为之立传的,只应是那些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上留下了个人印记的人,他(她)们是特定时代的“精英”,加速或延缓了特定时代车轮的前进。在为这些人物立传时,似应坚持以“正面人物”和名人为主的方向,防止把“反面人物”和普通人物摆在主导地位。因为“正面人物”比之“反面人物”、名人比之普通人物的事迹,其魅力和教育意义都要大得多。

李鸿章生前死后,人们始终对之褒贬不一,毁誉参半。有的给他戴上“东方俾斯麦”、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桂冠,有的则斥之曰:“李二先生是汉奸”、“乱世之奸雄”。人们对李鸿章的评价尽管如此不同,但有一点却是众口一词的:李鸿章是晚清的重臣,19世纪后半叶名满中外的人物,他在政治舞台上活动了半个多世纪,其中有一半时间“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巨”^②。因此,为他立传,既可了解他本人的思想、性格和生平事迹,又可透视晚清的政局和社会的演变趋势。

① 刘知几:《史通·人物篇》。

② 刘体智:《异辞录》,卷2。

把《李鸿章传》写成哪个类型的传记,这是我碰到的第二个问题。我认为人物传记大致分为文学传记和历史传记两种类型,学术专著和通俗读物两个层次。文学传记犹如人物画像,历史传记犹如人物照片,它们都以人物为原型,不同的是前者可以进行艺术加工,而后者则必须忠实于原型。通俗读物肩负着普及的使命,学术专著负担着提高的重任。两种类型和两个层次的人物传记,都为社会所必需,都有其存在的价值。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学术专著层次的历史传记,要求作到科学内容和优美形式的统一。所谓优美形式,是指结构新颖,文笔流畅,把传主的形象和神韵写得栩栩如生。所谓科学内容,是指如实的、多层次多角度的反映传主的思想、性格和生平事迹,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创新。

我个人是研究历史的,既没有诗人的激情,又没有小说家的技巧,因而只能勉强地撰写历史传记,没有条件撰写文学传记。我希望把《李鸿章传》写成学术专著,不是通俗读物。这是由于两个因素促成的。一是建国几十年以来,大陆还没有出版过一部学术专著层次的李鸿章传,只有50年代问世的两本通俗读物《卖国贼李鸿章》。台湾和国外学者写了几部李鸿章传,其中有的虽属学术专著层次,但往往存在着客观主义偏颇。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撰写一部学术专著层次的李鸿章传,实乃填缺补白的需要。二是作为学术专著层次的李鸿章传倘若写得成功,其流传的时间定会久些,学术的贡献定会大些,有助于推进李鸿章和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当然,要写出一部学术专著层次的李鸿章传,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李鸿章是个过渡社会产生的过渡性人物,思想复杂,角色多样,要准确地把握和公正地评价是十分困难的。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保证传记质量,我采取了两步走的作法,首先对传主活动的各个横断面进行了专题研究。相继发表了《李鸿章与太平天国》、《李鸿章洋务总纲略论》、《李鸿章与民用企业》、《李鸿章筹建北洋海军述略》、《李鸿章科举改革思想刍议》、《载湉、李鸿章与中日甲午战争》、《李鸿章与维新运动》、《孙中山劝李鸿章革命说质疑》等论文,在横断面专题研究的基础上,进而对传主的一生进行了纵向考察,并逐步完成了全书的写作任务。全书包括“读书但愿登科第”、“以儒生而起家军旅”、“‘自强’与‘剿捻’”、“富强相因”、“早期‘和戎’外交”、“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山重水复疑无路”、“秋风宝剑孤臣泪”等9个部分,共计31万余字。正因为这样,全书的写作,历经八载,风风雨雨,甘苦备尝。

如何处理作者情绪与历史真实的关系,这是我碰到的第三个问题。我认为真实性是历史传记的灵魂。所谓真实性,就是按照历史本来面貌来描述传主的“形”和“神”即生平事迹和思想、性格。传记作者“要有力量防止情绪支配自己”,避免戴着有色眼镜,依据自己的好恶,来剪裁历史,评价人物,而应该实事求是,力争使自己的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历史真实。我个人体会到,为李鸿章这样言行复杂而又众说纷纭的人物作传,“防止情绪支配自己”,坚持实事求是地论述其人其事,具有特殊的意义。有关李鸿章的资料虽然比较丰富,但很多却蒙上了一层迷雾。因而拨开迷雾,钩稽索隐,是一件十分繁重的任务。在这方面,我着重做了三项工作。一是把被歪曲了的事实改正过来,比如有关李鸿章在俄国接受贿赂、李鸿章镇压维新运动、李鸿章与孙中山合作搞两广独立等问题。二是把被埋没了的事实挖掘出来,比如有关李鸿章主张“变法度必先易官制”和改革科举制度等问题。三是把被删改了的李氏文稿原貌恢复过来,比如在《李文忠公全书》中有关沙皇接见李鸿章详情的密电被删掉和“董兵不剿匪而攻使署”的电文被篡改为“匪攻使署”等问题。

搜集和鉴别有关李鸿章的资料固非易事,但对有关李鸿章的资料进行逻辑推理就更加困难重重。在这方面难度最大的,一是对李鸿章的精神面貌、内心世界的探索,一是对李鸿章是非功过的评价。如果一部传记只讲传主生平事迹,而不深入传主的内心世界,反映传主的精神面貌,那就和一本年谱长编没有什么两样,只能见其“形”,而不能窥其“神”。李鸿章是一位精神面貌、内心世界非常复杂的人,加之他不像乃师曾国藩那样存有大量能够真实地反映心理动态的日记和家书,从而增加了探索的难度。李鸿章的思想脉搏,不能凭借传记作者的丰富想象力,任意编造,而只能依据传主的奏稿、诗文、信函和谈话,结合特定的时代环境、事件和人际关系,去进行合乎逻辑的推理。比如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时的心情,就是这样推导出来的。至于李鸿章的是非功过,不能因为他是“反面人物”,就夸大其过错或把他描绘成一无是处,而应从历史事实出发,进行具体的全面的评价,是即是,非即非,是功就应肯定,是过就该批判。李鸿章干过许多束缚生产力的勾当,如镇压农民起义、对外妥协和出卖主权等。这是他一生中的主流。但是毋庸讳言,他也做过一些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事情。如倡导洋务新政、同情维新运动、对外保持某种抗争性等。有人把洋务运动说成“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互相勾结的产物”,断定李鸿章

是绞杀维新运动的刽子手,否认李鸿章对外具有抗争性,但是,经过深入研究,我发现这些论断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如何处理人物、阶级和社会的关系,这是我碰到的第四个问题。我认为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着阶级和个人的活动;而个人的活动则归结为阶级的活动,这些阶级的斗争决定着社会的发展。因此,历史传记就既要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特定的阶级关系中,描写传主的思想、性格和生平事迹,又要通过传主的思想、性格和生平事迹透视特定的阶级关系的变动,反映特定的社会历史的变迁。按照这条思路,我在写李鸿章传稿时,遇到两个问题:(一)李鸿章与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二)李鸿章与封建统治阶级的关系。

李鸿章生活在19世纪后半叶,其间经历了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等重大历史事件。李鸿章同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结下不解之缘。写李鸿章传时,既不能离开这些重大历史事件而孤立地叙述其个人活动,又不能将其个人活动湮没在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之中。犹如一幕话剧,重大历史事件是演出舞台,传主则是演员群体中的主角,主角始终处于舞台的中心位置。写李鸿章传,重点不在于叙述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而应该是叙述李鸿章在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表现。

李鸿章隶属于清朝封建统治阶级,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最终制约着李鸿章的活动。李鸿章与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在阶级立场和政治观点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之间纵然在一些重大的内政外交问题上存在着某些分歧,但那也只不过是属于支流而已。然而,过去人们却往往离开特定的阶级关系而孤立地论述李鸿章其人其事,过多地追究他个人的历史责任。事实上,在处理某些重大的内政外交问题时,李鸿章往往扮演着决策参与者和决策执行者的角色,如果这些决策是正确的,那么其功绩势必记在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整个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账上。如果这些决策是错误的,那么其罪责无疑也应由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清朝封建统治阶级来承担,既不能把功绩完全划归李鸿章,又不能把罪责完全推给李鸿章,应该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价李鸿章的是非功过。

《李鸿章传》终于在1991年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在学术著作出版陷于低谷的时候,《李鸿章传》竟能多次印刷,印数多达2.8万册,实属难能可贵。《李鸿章传》是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有关清末重臣李鸿章生平的学术著作,因而受到史学界的重视。人民出版社和河北师范学院联合召开了“《李鸿章

传》与历史传记写作座谈会”,来自京、津、晋、冀的学者赞誉《李鸿章传》“选题有识见,大陆第一本”、“实事求是,不偏不倚”、“史料丰富,选材精当”、“寓论于叙,细腻生动”。《光明日报》记者马宝珠同志还专程采访了我,并将采访记录以《如何为复杂的人物立传——苑书义教授谈〈李鸿章传〉》为题,刊登在1992年5月31日出版的《光明日报》“史学·史家近闻录”上。

四、中国的近代化运动是如何起步和展开的

随着历史跨进90年代,我的研究重点也从李鸿章转向中国近代化问题。研究中国近代化问题,既是站在现时的高度回溯历史的结果,又是研究李鸿章的延续和深化,因为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先驱,研究李鸿章势必涉及中国近代化问题。

实现近代化,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长期以来,史学界却忽视或回避了对中国近代化的研究。直到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才逐渐地改变了这一人为的偏差,开始把中国近代化问题提上了研究的日程。我对中国近代化的研究,是从广泛研读国内外有关著作起步的。我先后研读了[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美]兰比尔·沃拉著《中国:前现代化的阵痛》、[美]乔纳森·斯潘塞著《改变中国》、[日]依田惠家著《日中两国近代化的比较研究》和罗荣渠主编的《从“西化”到现代化》等专著。在吸收他们的积极成果、借鉴他们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考察,可谓初战告捷。我相继在《近代史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中国近代化历程述略》、《近代西学与中国近代化的命运》和《孙中山设计的农业近代化方案》等三篇论文,并向在广东召开的“太平天国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了题为《自发的农民斗争与中国近代化》一文,该文业已收入该讨论会论文集。

近些年来,我在中国近代化方面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

近代化的主角与内涵 我认为所谓近代化,在英法等西欧国家,就是资产阶级通过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使社会摆脱中世纪的封建形态而资本主义化。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等方面的改革。而中国的

近代化,却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标,两易主角和内涵。之前,近代化的主角是民族资产阶级,内涵是推封建主义之陈,行资本主义之新;之后,无产阶级跃居近代化的主角,近代化的内涵也随之变为推封建主义之陈,行新民主主义之新。新民主主义社会,既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形态。五四前后中国近代化的主角和内涵之所以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一是外因即国际环境不同,俄国十月革命前,世界是资本主义一统天下,之后在世界上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对立制度并存的局面。二是内因即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五四之前,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五四之后,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肩上。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而无产阶级则要求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为实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

近代化与反帝反封建的关系 我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决定了近代中国要实现近代化,就必须解决近代化与反帝反封建的关系问题。在这里既不应离开近代化而孤立地谈论反帝反封建斗争,又不应低估反帝反封建斗争对近代化历程所起的先导作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从研究经济近代化与反帝反封建的关系入手,因为经济近代化是近代化的核心,只要搞清经济近代化与反帝反封建的关系,其余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我经过认真研究,得出了这样三个结论。即: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中国社会经济只能形成“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的格局;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从低级形态向较高级形态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三、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依赖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

与英法等国近代化历程比较 我认为近代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世界各国近代化的历程却不尽相同。和英法等西欧国家近代化历程比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近代化道路具有明显的特色:一是近代化的主角和内涵不同,已如上述。二是英法等国的近代化,是以思想革命为先导的,而中国的近代化虽然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启蒙运动,但是这些启蒙运动的内容、性质和结局,在五四运动前后却有着明显的不同。三是英法等国的近代化,是其社会内部矛盾自然演化的结果,而作为落后国家的中国近代化,除了中国社会内在的动力之外,还有对资本帝国主义殖民侵略和世界近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被迫中断自己的正常发展程序,移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四是英法等

国的工业化是同农业近代化互为促进的，而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的进程则是严重脱节的。五是英法等国从封建专制向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转化，经过不断地革命或改良，呈现剧烈的震荡和深远的回旋，英国才建立起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法国才确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于中外反革命势力的强大，所以从专制向民主的转化，走的是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社会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殊死的搏斗。

西学与中国近代化 在中国逐步实现近代化的过程中，西学究竟处于什么地位，起着什么作用呢？这是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我主要探讨了1840—1919年间西学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我认为国际环境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决定了近代中国要实现近代化，就必须在坚持反对殖民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同时，打开封闭的国门，勇敢地走向世界，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主动地多渠道地引进西学。在1840—1919年间，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文化，主要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基础之上的，以民主和科学为中心构成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当时在中国社会内部占据统治地位的，则是建立在封建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以儒家学说为核心构成的封建阶级文化。两种异质文化一经接触，就开始了撞击和交融的过程，犹如投石击水，激起层层波澜，守旧分子排斥西学，先进人士力主学习西方。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贯穿于整个近代中国历史的始终。守旧分子站在古旧的封建主义立场上，惧怕引进西学会导致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和封建体制的破裂，幻想把中国拖回到闭关自守、封建统一的旧时代里去。先进人士主张效法西方，改造中国。所谓先进人士，就其阶级性格和具体主张而言，是伴随着社会变动而新陈代谢的。起初是地主阶级改革派，主张学习西方近代文化物质层面的所谓长技，即“坚船利炮”和“养兵练兵之法”，“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把“师长之说”付诸实施的，是以一批满汉军政要员为中坚的洋务派。洋务派从传统的“道体器用”观出发，归纳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理论模式，主张以中国之道，用西方之器，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西方富强之术。他们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采用西学，举办洋务，固然给西学提供了一个进身之阶和用武之地，但是由于把“西用”放在“中体”的轨道上，只想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甲冑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因而就绝不可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要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就必须冲破“中体西用”的樊篱，学习理论和制度层面的西方近代文化，取法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最